

# 十七至十九世紀法國易學發展史略（下）

賴貴三

（續上篇）

## 三、白晉與索隱派推動易學在歐陸的發展

法國從十七世紀起，就在漢學西傳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巴黎更是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一直都是歐洲漢學的學術研究中心。在這三百多年間，〔清〕聖祖康熙二十六年（1687），《易經》的第一本西方譯本正式在巴黎出刊，同年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抵達中國，白氏與其所創立的索隱派（Figurism）積極鼓吹《易經》的研究，對《易經》在歐陸的流行和發展之貢獻，無人可比。以下分別各家（包含比利時法語耶穌會士）說明：

### （一）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柏應理為比利時耶穌會教士，字信未，受到剛從中國回來的衛匡國影響，要求前往中國傳教。柏氏在〔明〕永曆十三年（1659）抵達中國，在上海、蘇州、鎮江、淮安等地傳教，達23年之久。

柏應理與殷鐸澤（P. Prosper Intercetta, 1625-1696）、比利時耶穌會士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7）、奧地利耶穌會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 1624-1684）等，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敕令，翻譯合編《西文四書直

講》，將《大學》、《中庸》、《論語》（獨缺《孟子》）譯成拉丁文，拉丁書名為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國哲學家孔子》）。《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巴黎正式出版；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出版法文節譯本《孔子的道德》；康熙二十八年（1689），再出版另一本法文節譯本《孔子與中國道德》。其中，《孔子的道德》於康熙三十年（1691），在英國出版英文節譯本。目前在歐洲很多圖書館都存有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可見這本書對孔子、孔子學說及《易經》在歐洲的傳播，都有一定的影響力。此書共412頁，包括四個部分：1. 柏應理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獻辭。2. 導言：論《四書》、《五經》的歷史、要義、宋明理學等，歷朝歷代對《四書》、《五經》的重要注疏，佛老和儒學之間的區別，《易經》六十四卦和卦圖之意義。3. 《孔子傳記》，開卷即是孔子的全身像，為殷鐸澤所著。4. 《大學》、《中庸》與《論語》的譯文，各為39頁、69頁和180頁，三書皆附注疏。最後附有柏應理編的《中國皇朝編年史》（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以及柏氏繪畫的中國15省省圖、115座大城市，以及耶穌會士建立的近200處教堂。

書中也附有柏應理以拉丁文翻譯的《易經》六十四卦和卦義，西方從此得知中國《易經》。惟柏應理的譯文用字十分冗長，例如第15卦謙

卦，譯者用四十四個拉丁字來解釋《易經》「謙卦」的六字爻辭：「六二，鳴謙貞吉。」不過，由於柏應理編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能在中國傳教，並為禮儀之爭問題辯護；因此，柏氏在書中把中國描寫成完美無缺的文明先進，是值得模仿的理想國家。這本書使歐洲人開始注意中國，引發歐洲掀起一股「中國熱」。像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便提到：「今年巴黎曾發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稱為中國哲學之王者。」萊布尼茲後來發現《易經》二進位原理時，也曾提到柏應理的這部著作。

柏應理這部在巴黎出版的《易經》拉丁文譯本，與金尼閣在杭州印行的拉丁譯本，相去四十年，這是第一本在西方世界出版的《易經》外語譯本，因此柏氏也成為最早向西方介紹《易經》的耶穌會傳教士。

## （二）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 與索隱派

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白晉，是十七、八世紀間向歐洲學界大力鼓吹《易經》的西方易學家，稱得上是西方真正深入研究《易經》的第一人，是易學先驅，也是易學傳播者。白氏在《易經》的西傳史上，扮演著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性角色，對易學史的貢獻居功厥偉。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太陽王」（Le Roi Soleil）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選派白晉、李明（Louis le Comte）、張誠（Jean F. Gerbillon, 1654-1707）、劉應（Claude de Visdelou）、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塔夏爾（Tachard）等六位傳教士出使中國，行前授予「國王數學家」稱號。1685年，使團自布勒斯特（Brest）起航，途經暹羅時，塔夏爾被暹羅國王留

用。其餘五人於康熙二十六年（1687）抵達浙江寧波，1688年入北京，白晉與張誠二人為康熙賞識，隨侍宮中；其餘，則分散至中國各地傳教。

白晉（又譯「鮑威特」），字明遠，在中國傳教36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即柏應理在巴黎出版《西文四書直講》的同一年，抵達中國傳教；翌年，抵達北京，深獲康熙皇帝喜愛，更奉康熙之命，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三十八年（1699）之間，返回法國招募更多耶穌會士到中國。白氏在回法國期間，曾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巴黎作了一次《易經》的專題演講，白氏在演講中說：

……雖然（我）這個主張不能被認為是我們耶穌會傳教士的觀點，這是因為大部分耶穌會士至今認為《易經》這本書充斥著迷信的東西，其學說沒有絲毫牢靠的基礎……。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易經》這本書中蘊涵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造者和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再說，除了中國瞭解我們的宗教同他們那古代的合理的哲學獨創多麼一致外（因為我承認其現代哲學不是完美的），我不相信在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方法更能促使中國人的思想及心靈去理解我們神聖的宗教。所以我要著手騰清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

在這段話中，顯然白晉一方面推崇《易經》，認為《易經》與柏拉圖（Plato, ca.427-347B.C.）哲學、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 384-322B.C.）哲學一樣是合理而完美的哲學；另一方面，白氏認為《易經》的義理與天主教的教義一致，這是打開中國人的思

想及心靈並讓他們理解天主的唯一方法。在《康熙皇帝》一書中，白晉也說：「雖說康熙皇帝是個政治家，但他如果對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懷疑，就決不會許可天主教的存在。」換言之，只要能證明中國古經與天主教義的內容一致，就可以讓康熙信仰天主教；康熙若能信仰天主教，那全中國都可以納入天主教的版圖。

在這種信念的推動下，白晉一生都努力在上古時代的中國典籍中尋找聖經教義。白氏知道康熙皇帝喜好科學，便投其所好，用數學方法解釋《易經》，再由《易經》中尋找天主。他說：

《易經》數字的神秘，似與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埃及猶太哲學中的神秘數學相呼應，此秘密是由第一個祖先給其後代的，雖然後來消失了，但必然是來自造物主之神秘啟示。

白晉企圖通過揭示「數學中的神秘」，以證明中國祖先所遺留下來的聖典——《易經》，其實與希臘、埃及猶太哲學中的神秘數學相呼應。白氏認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創世及三位一體之奧秘」，並認為「世上沒有比研究那包含真理而又如此難解的《易經》更能顯示中國人的心神是如何契合於基督教義了」。

白晉這種傳教方式顯然是利瑪竇「適應政策」的一種運用，帶著無限濃烈熱忱的宗教情懷作後盾。如白晉在1700年11月8日，寫給萊布尼茲的信中說：

今年我曾經應用同樣的方法繼續對中國古籍進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發現。……幾乎完整的一套聖教體系，即在其中……。極大的神秘，如聖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

世與受死，以及他宣教的聖工（對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這類似預言性的表現，在珍貴的古代中國哲學巨著中，亦隱約有跡可尋。當你看到這無非是聯篇累牘的虛無與象徵的詞語，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讖語時，你的驚奇程度當不在我下。

像白晉這樣經由考據、索隱的方式企圖從中國古代典籍、尤其是《易經》中尋找《聖經》的神諭、預言、教義以證明《易經》和基督教教義一致的作法，在當時的歐洲被學者稱為索隱派（Figurist，或稱符象論、尊經派、易經派），而白晉就是索隱派的鼻祖。

白晉對《易經》的研究直接影響了萊布尼茲，他們二人至遲從1701年開始就在書信往返中討論到伏羲、八卦及二進位的問題；白晉曾寄給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tz, 1646-1716）兩幅「易圖」：Segregation-table，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以及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ment，即《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或亦承自衛匡國；而衛氏之圖，當自朱熹（1130-1200）《周易本義》所錄邵雍（1011-1077）之卦圖。此外，白晉也與其他法國索隱派耶穌會士如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quet, 1665-1741）、郭中傳（Jean-Alexis de Gollet, 1664-1741）、馬若瑟（Joseph-Henri-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等人在通信時討論《易經》，並留下不少中文、拉丁文手稿，成為西方易學研究的珍貴史料。至今在羅馬梵蒂岡教廷圖書館中仍保存著大量白晉的《易經》研究手稿，包括1711年的《周易原旨探》、《易鑰》、《易經總論稿》、《易考》、《易引原稿》、《易學外篇》、《大易原義內篇》、《易學總說》、《太極略說》等。

除白晉外，傅聖澤和馬若瑟是另外兩位索隱派的代表人物，兩人都是白晉奉康熙之命在法國招募來的傳教士。傅聖澤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白晉一起抵達北京後，最初在福建和江西傳教，康熙五十年（1711）被康熙召至北京，協助白晉進行《易經》的翻譯和系統化的全面性研究，撰有《易經稿》。傅聖澤在中國生活22年（其中有10年在康熙身邊），傅氏博覽中國古籍，和白晉一樣相信在《易經》和《書經》等中國經典中，可以找到天主的啟示。傅氏認為中國古籍中的「道」和「太極」就是基督信仰中所崇拜的真神，而《易經》即真神傳給中國人的玄秘經典。傅氏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離開中國時，攜帶了近四千（種）冊中國古籍返回法國，全部捐給法國皇家圖書館，為法國及歐洲學者研究中國古典經籍帶來極大的便利。

### （三）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馬若瑟是白晉增邀來的10名法籍耶穌會傳教士之一，也是法國漢學家先驅之一。馬氏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隨白晉到中國後，便一直待在中國，在江西饒州、建縣、南昌、九江等地傳教，長達25年。〔清〕雍正二年（1724），基督教在中國被禁，馬若瑟離開在江西省的傳教點，到廣州；雍正十一年（1733）遷居澳門，據說乾隆元年（1736）在澳門去世。

馬氏精研中國學術經典，用漢語著《經傳論》十二篇，《易經》是其中之一。此外，馬氏著有法文本的《易經入門注釋》，現存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編號2720，書中詳細介紹其治易過程，第一章分兩部分，各有四篇文章，分別論述「乾」與「坤」；並對《易經》各卦作分別論述，介紹十分詳細。

此外，馬若瑟編寫《漢語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9），此書不是一般的文法書，而是一本幫助歐洲人利用學習漢語來研讀中國經典的入門書。至於研讀中國經典的目的，當然是尋找隱藏在經典中的真理。馬若瑟著有法文本《易經入門注釋》，在此書中，馬氏在雍正六年（1728）寫給法國漢學家始祖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的信中說到，他曾將一篇關於《易經》長篇手稿寄給了傅爾蒙。有人認為這長篇手稿即此書。馬若瑟曾自述道：

我之所以要不顧一切寫這個注解，其最終目的，假如我能夠的話，無非是使世上的人們瞭解到天主教和人類歷史是同悠久的，而且這個創造象形文字和編寫「經」的中國人對成為人的天主（God-man）認識最為清楚。我親愛的朋友，這就是三十多年來一直在支持我和鼓勵我鑽研的唯一動機，捨此就毫無意義可言。

由上述文字中，可以強烈感受馬若瑟研讀漢學背後那股強烈而堅定的宗教熱忱。這些索隱派成員們為了從中國古籍中發掘天主教教義，努力鑽研中國古籍和語言文字的作法，對其他耶穌會士而言，未免是有些本末倒置、甚至太牽強附會了，終於引來其他耶穌會教士的批評，最後法國教會及羅馬教廷對這些索隱派會士對中國經典的研究，尤其是鼓吹《易經》的做法感到反感，說他們是：「著了《易經》的魔。」索隱派的《易經》研究於是被迫終止。

雖然索隱派的《易經》研究畫下了休止符，但是他們所散播的種子，卻使歐洲學人對《易經》的興趣和喜好，得以綿延不絕地繼續發展。白晉及其索隱派對西方易學的傳播和發展，亦可

謂功不可沒。除白晉及索隱派外，其他也有一些耶穌會士對《易經》作了若干貢獻，茲分別敘述如下：

#### (四) 劉應 (Claude Visdelou, 1656-1737)

劉應是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與白晉一同抵達中國的第一批法國耶穌會士，曾先後在北京、南京、廣州、陝西等地傳教。劉氏精通漢語，廣泛涉獵中國古籍，對《易經》也有研究。劉氏在雍正六年（1728）曾作《易經概說》（*Notice sur le Livre Chinois I-king*），是最早對《易經》進行注釋的耶穌會士之一。劉氏的注釋收錄在宋君榮的《書經》譯本後，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出版，後來並被輯入《東方聖經》（*Livres Sacres de l'Orient*）中。

#### (五) 宋君榮 (Antonious Goubil, 1689-1759)

宋君榮，字奇英，法國傳教士人。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來華傳教，乾隆二十四年（1759）過逝於北京。在傳教過程中，對《周易》作了深入研究，並將之譯成法文，編著有法譯本《易經》（*I Ching*）等六部漢學著作。漢學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認為：宋氏是當時歐洲最精通中文的人物，盛讚他是「18世紀最偉大的漢學家」。宋氏《書經》譯本完成於1740年代，但並未出版，乾隆三十五年（1770）才由法國學者德經（*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增刪後出版。

#### (六) 雷孝思 (Jean Baptiste Regis, 1663-1738)

雷孝思，字永維，法國傳教士，也是白晉在法國招募的耶穌會士之一。雷氏於康熙三十七年

（1698）來華傳教，在傳教過程中，對《周易》發生興趣，在另一位法國傳教士馮秉正（*P. Jos-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的幫助下，再次將它譯成拉丁文《易經》（*I Ching*）。按：馮秉正，法國傳教士，漢學家；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來華傳教，幫助雷孝思譯成並出版拉丁文本《易經》（*I Ching*），又著有《中國皇輿全圖》（為主要撰寫人之一）、《聖年廣益》等漢學著作。

這本拉丁文譯本一直到約一百年後，才由德國的東方學者莫耳（*Joseph Mohl*）輯成兩冊，分別於道光十四年（1834）、十九年（1839），在巴黎出版。雷氏利用拉丁文翻譯《易經》，以《周易折中》為本，《周易折中》係康熙皇帝命大臣李光地（1642-1718）等人編纂，費時兩年，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成，內容參考了朱熹（1130-1200）的《易學啟蒙》和《周易本義》，對朱子學說進行闡釋。雷氏參照法國傳教士馮秉正的譯文及滿文譯本對照，再加上湯尚賢（*Pierre-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4*）的注疏（馮及湯的譯作都未曾出版），在乾隆元年（1736）完成書名為《易經——中國最古之書》的拉丁文版《易經》。雷孝思譯筆簡潔，與柏應理的拉丁文版《易經》相比，同一個「謙卦」，柏應理用了四十四個拉丁字解釋，雷孝思則僅用了六個字：「*Clamosa seu apparens humlitas, solidum bonum.*」

全書共分三卷，第一卷有一長序，共十一章，討論《易經》作者、內容、來源、著易的目的，以及有代表性的注疏本。序之後共八章，前七章論伏羲所創八卦、各種符號及其變化；第八章論《易經》與五經的關係，間接批評一些傳教士試圖從五經中，找出與基督教相一致的看法。第二卷為原文及注疏的翻譯及譯者的解釋。第三

卷為《易經》的評論。雷孝思這部《易經》是西方世界第一份完整的拉丁文《易經》譯本，後來被轉譯成多種歐洲語言，流通西方各國。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曾評論這本書是「迄今為止已經出版的書中最有價值的（譯本）」，可見這本書在西方易學史上的地位。

### （七）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錢德明，字若瑟，法國傳教士。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2月8日，生於法國土倫（Toulon）；乾隆二年（1737）9月27日，在阿維尼翁（Avignon，即一般通稱的「亞維農」）進入耶穌會修道院；乾隆十四年（1749）12月29日，從洛里昂（Lorient）乘船出發赴華。乾隆十五年（1750）7月27日，到達廣州；翌年（1751）8月22日，晉京。錢氏通曉滿、漢文，學識淵博。

錢氏本人為天文學家和作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法國在華傳教區的司庫；乾隆四十四年（1779）11月18日，出任法國在華傳教區會長；乾隆五十八年（1793）10月9日，逝世於北京。錢氏是入華耶穌會士中，最後一位大漢學家。由於錢氏對《易經》頗感興趣，曾通過《易經》卦爻辭史料考證，斷定中國紀年體古史，比其他各國歷史的可信度高。著有《中國古史實證》（*L'Antiquité des Chinois Provéée par les Monuments*）等七部漢學著作。

錢德明神父有關中國的著作很多，如《滿蒙文法滿法字典》、《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匯》、《中國歷代帝王紀年》、《紀年略史》、《孔子傳》、《四賢略傳》、《列代名賢傳》、《孫吳司馬穰苴兵法》、《中國古代宗教舞蹈》、《中國學說列代典籍》等。錢氏能用漢

文、法文以及滿文、蒙文等文字著書立說，是一位罕見的多才多藝的傳教士漢學家。

除此之外，錢德明神父也積極向法國傳播中國音樂，錢氏主要著作共有兩部，其一為乾隆十九年（1754），對清朝大臣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1642-1718）《古樂經傳》的法文譯稿，其二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錢氏於北京寫成的《中國古今音樂篇》。錢氏還著有關於中國音樂的一些其他零散著作及書簡，也把中國的一些樂曲和樂器寄往法國，因此導致法國學人圍繞著錢氏著作，而掀起一股研究中國音樂的熱潮。

### （八）霍道生（Paul-Louis-Félix Philastre, 1837-1902）

霍道生，法國海軍軍官，安南學專家，可能是第一個出版完整的法文《易經》譯本的人。霍氏是法國第一批到越南作地理考察的人員，因此他對安南語的漢語有所研究。霍氏翻譯的法文《易經》，書名為《周易首次法譯本》，大意是：《周易首次法譯本——附程子和朱熹的全部傳統的注疏及主要注釋家的注釋摘要》。可知，霍道生除翻譯《易經》外，還把程頤（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的全部注疏翻成法文附在書內。全書共分兩卷，第一卷在光緒十一年（1885），發表於《基格博物館年刊》第8期；第二卷與第一卷相隔8年後，才在光緒十九年（1893），發表於該刊物第23期。這本法文譯本是一般公認的標準法文本《易經》。

### （九）哈雷茲（Charles-Joseph de Harlez, 1832-1899）

哈雷茲，比利時漢學家，出生於貴族家庭，法律系畢業後又讀神學系，1858年出家成為耶穌會士。他研究宗教神學、文化和語言學，

研究波斯文、梵文、滿文和中國。1880年代後期，開始研究中國宗教、歷史和文化，對孔子、《易經》、老子等都有研究。曾任比利時魯汶（Louvain）大學教授，光緒二十五年（1899），成為比利時皇家學院院士。他一方面接受英國東方學家拉古貝里（Albert Etienne Jean 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解釋《易經》的理論，一方面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卦」是書寫的符號。他認為漢字符號同卦一起使用。而不是單純的名字選擇。光緒十三年至二十三年（1887-1897），他始終堅持這一理論。這種理論使西方人容易接受。

大約在霍道生發表《易經》譯作的同時，哈雷茲於光緒十三年（1887），首先在《亞洲學報》上發表《易經原文》，後在巴黎單獨成篇出版。光緒十五年（1889），哈雷茲又於布魯塞爾，出版另一本法文版：《易經——復原、翻譯與注釋》，書中還收錄《易經》的滿文注疏。光緒二十二年（1896），由瓦爾·德雷毛（J. P. Val d'Eremao）轉譯成英文，由英國沃金東方大學研究院出版。翌年（1897），哈雷茲自己又把法文版中的滿文注疏翻成法文，重新在倫敦印行。哈雷茲的法譯本《易經》至今還享有盛名，1958年由貝克爾（Becker）加上序言再版，書名作Le Livre des Mutations，是當今西方通用的法譯本。

哈雷茲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他的譯本，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通報》（T'ung Pao or T'oung Pao）第七期上，發表了〈《易經》注解〉一文，這是他研究《易經》的重要成果之一。此外，他撰寫的易學論文有：〈《易經》的真實性與解釋〉、〈《易經》是中國古代占卜書〉、〈《易經》的象意符號〉等。哈雷茲治易的特點，在於認為《易經》原來是一本字典，他把每

一個卦解釋為一個字，不同的爻辭只是在解釋該字的意義和用法。因此，哈雷茲研究《易經》的方法和理論，在西方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 四、結語

西方易學仍在發展變化之中，一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變易與不易。用衛禮賢公子衛德明的講法，《易經》「從萊布尼茲開始，對歐洲第一流的思想家產生過很大影響」；在二十世紀，《易經》也的確使榮格這樣的心理與思想家為之傾倒。

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又譯「江格」、「容格」、「容克」等，瑞士人，著名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精於西方易學史上的卜筮類研究，重點研究《易經》之心理現象，將問卜作為探索潛意識的一個方法。認為《易經》的方法確實把存在於事務和人們中隱微的個別品質，包括在一個人的潛意識自我中隱微的個別品質都考慮進去了。認為《易經》始終堅持自知之明，而且是一本關於要悉心審視自己的性格、態度和動機的長篇勸說書。認為中國人立場的本身與人們對占卦問卜持何態度無關。其有關易學見解，可見《易經英譯版·前言》。

因此，從十六、十七世紀耶穌會士的發軔，一直到近現代的西方易學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有兩位，一是德國的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他善於利用當代知識份子的術語來闡釋《易經》，韋利（Walley）稱之為「經文的譯法」；二是俄國的休茨基（Iulian K. Schutskii, 1897-1941），他善於探求《易經》在寫成之初所具有的涵義，以考據批判與史學並用，韋利（Walley）稱之為「文獻學譯法」方法。《易經》在西方流傳了四百多年，未來，在現代

科技的帶動下、隨著網際網路的便利和地球村時代的來臨，相信易學將會以不同於以往的面貌，繼續在西方世界發展下去。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專任教授，曾兼任國際漢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及創所所長。)

### 歐華年會第37屆年會巴黎圓滿落幕

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第37屆年會7月22日至24日在巴黎長榮桂冠酒店盛大舉行，逾300位來自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西班牙、荷蘭、瑞典、義大利及奧地利等國僑胞出席。

歐華年會是歐洲地區最大型的僑胞集會，同時也舉辦中山學會年會及團結自強協會歐洲分會年會。

3天會議舉辦了多場專題演講，包括駐法代表呂慶龍「由台法外交關係看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和監察委員葛永光談「全民總統與中間路線：馬政府施政之評估與展望」。

會議也著重經濟與貿易議題，安排外貿協會副秘書長葉明水演講「台灣經貿願景」，以及駐法代表處經濟組長石心主持台灣投資環境說明會。

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專程親臨巴黎參加年會，鼓勵僑胞邀外國友人赴台觀光，十月返國參加建國100年國慶活動。與會僑胞關心台灣政治發展，廣泛談論明年大選相關議題。吳英毅鼓勵僑胞回國參與投票。

法國國民議會友台小組主席國會議員布賀德 (Francois Brottes) 和碧西聖喬治市 (Bussy St Georges) 副市長路易 (Claude Louis) 等外賓，出席23日舉行的揭幕典禮及致辭。

年會也進行聖火會師。22日晚，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委員蔡國泰，將迎自檀香山的百齡薪傳聖火，傳遞給歐華年會籌委會主任委員黃行德。聖火將於10月9日傳回台灣。

年會並決定第38、39及40屆年會舉辦的地點，分別是西班牙、荷蘭和奧地利。

(文／巴黎華報副總編輯施文英)

